

防企业发债风险须走立法途径

兑现农民工工资不能做“选择题”

莫开伟 财经评论员

侨兴超 3.12 亿元债券逾期违约风波,再次引发业界瞩目。这是即将过去的 2016 年债市爆发的又一起违约事件。(12月21日财新网)

当前,企业因受自身经营决策及国内外经济下行等诸多因素影响,原本发行的债券到期出现偿付违约事件并不奇怪。打破债券刚性兑付以后,债券市场买者风险自担的法定原则也日益深入人心,投资人购买政府债及企业信用债后,享受高收益而又不愿承担风险、且出现兑付问题还有政府或相关部门为其买单的“双赢局面”已成历史。所以,侨兴亿元债券违约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现在关键问题是,侨兴企业作为发债主体,在债券到期本息偿付出现违约情况下,负有不可推卸的偿付责任;且该企业债券违约还有两个特别有利的条件是,当侨兴企业本身资金流出现困难、无力偿付投资人本息时,后面还有“双重保险”作后盾:第一是侨兴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吴瑞林以其

全部身家价值近 1000 亿元资产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第二是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引入了担保机制,让财力雄厚、注册资本 15 亿元、身后有强大股东支撑、偿付能力为 266% 以上的全国性财险公司——浙商财险提供偿付违约保险,给所有投资人投了一份保险。

按理说,在这起债券违约事件中,赔付资金应该不成问题,可问题是企业发债担保人和保险人都在打诿,有相互推诿之嫌,让发布产品信息的中介机构蚂蚁金融陷入了舆论危机之中,成了事件的受害者;更让不少投资者对金融信息平台产生了担忧甚至动摇,给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巨大的无形压力。

事件为何会发展到如此糟糕的地步?仔细想来原因有二:一方面,监管部门没有尽到应尽的监管义务和责任。比如浙商财险在侨兴债违约时,本应无条件启动违约理赔程序,但行动缓慢,理赔不积极,存在“踢皮球”嫌疑;面对保险机构这种行为,保险监管机构应当立即出面调查了解并督促保险机构

履行理赔义务。可令人遗憾的是,证监会至今对此事尚未发声,不予置评,让社会公众和广大投资者有点寒心。另一方面,企业发债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对发债企业的担保人履责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力。对侨兴两企业发债履行不可撤销担保责任的侨兴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吴瑞林至今未履行担保偿还责任,蚂蚁金服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轻易奈何不得,需要当地司法部门出面,对担保人实施强制履行担保义务。可令人不解的是,当地政府也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这让参与各方及广大投资者有点失望。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监管机构对企业发债风险控制不严,对企业高杠杆发债行为存在放任自流现象;且不少银行资金也涌入债市,推高了债市杠杆,使企业发债超过自身偿还能力,出现了轻松违约机遇,为企业进入债市高杠杆融入资金大开方便之门。作为经营电信业务的企业是否具有偿还发债总额的能力,缺乏正确风险评估,只凭担保和保险就为其大开绿灯,显然失之偏颇,有酿造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

因此,尽快化解侨兴债券违约事件,还须保险监管当局和当地政府形成合力,也即证监会应严厉督促浙商财险无条件履行理赔责任,以告慰广大投资人;当地政府应立即督促司法机关排除阻力,对侨兴发债担保人强制实施财产冻结、变卖等法律程序,充分履行担保义务,以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同时,在此基础上,为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应建立企业发债风险严厉监管机制,即将企业发债主体、担保人、保险人资格审查走严格司法审查途径,将发债人、担保人、保险人履行的责任纳入立法高度,还义务途径,对债券违约实行无条件偿还义务,使企业债券违约有法可依,投资者权益有法可保。尤其,要看到,债市是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也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通道;即使打破刚性兑付,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企债券违约可以视而不见、弃而不管,而应在法律上有所作为,为企业发债和保证投资人利益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唯有如此,才能将债市引向健康发展轨道,有效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杜才云 职员

“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拖欠我们的血汗钱。”年关将至,大批农民工又将踏上返乡之路,如何保障他们的工资及时支付,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人社部等 12 部委近期联合下发通知,决定从 11 月 15 日至明年春节前在全国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一张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大网在全国各地铺开。(12月18日人民网)

“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拖欠我们的血汗钱。”这是广大农民工的心声。年关将至,大批农民工又将踏上返乡之路,农民工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能否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不只是劳动者们关心的大事,更应该成为政府行为。

《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是国家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积极回应。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 1 号文件下发《意见》关注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出了五方面从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的 16 条具体治理措施。

今年 11 月,国家 12 部委又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引导各地各部门联合行动重拳打击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确保农民工足额拿钱过年。

透过现象看本质,国家对农民工工资问题发文件安排部署,并以 12 部委名义下发专项检查通知,其弦外之音就是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工资问题重视不够、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大小“老赖们”光教育还不够,还必须通过上级发文倒逼,才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到这里,网友们不禁要问:“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有这么难吗?”其实,治理欠薪问题并没有传说中那样难,只是由于各地方政府重视不够而已。理由是:地方政府大大小小的工作任务都能够完成,而且欠薪企业是当地的,“老赖们”是自己辖区的,要督促他们把拖欠的工资支付了,对政府来说仅仅是一句话的事情。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对农民工问题视而不见、不动真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将兑付农民工工资作为考核内容,没有将其作为晋升的重要依据,简单的说,就是没有将兑付农民工工资作为政绩。

愚以为,如果将兑付农民工工资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与地方党政负责人的“帽子”、绩效直接挂钩,地方上必将将其作为重要工作内容纳入议事日程,“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对相关部门层层下达“死命令”、倒排工序、挂图作战、务求实效,使用各种“土洋结合”的手段惩治“老赖”,迫使众多企业不敢当“老赖”,全力完成落实清欠目标任务,农民工领到“辛苦钱”不在话下。

地方重视不重视,关键看地方政府做不做“选择题”。任何工作都应该落实,地方政府本无权做选择题。但按惯例,地方政府会把其他政绩考核范围内的事情先做并作好。如果没有纳入到政绩考核内容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惩治“老赖们”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或选择性遗忘,或慢做,或稍后做,要彻底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就是不能让地方政府做愿意干还是不愿意干的“选择题”。

其实,若将兑付农民工工资事项纳入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政绩考核的常规内容,对地方官员们来说是一个下定决心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维护长治久安的重大策略,对于农民工来说,能够按月领到“血汗钱”,是一个永久的利好消息。故,对于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其本身并不复杂,只需要列入政绩考核目标就行。

公立医院为何成了欠药款的“老赖”

舒圣祥 媒体评论员

近日,一份湖南省商务厅致函省医改办要求责成湘雅等 20 家公立医院尽快向药品配送企业兑现药款的图片在网络上热传,2016 年初至今,仅长沙市区内的 20 所公立医院就拖欠了药品配送企业药款超过 400 亿元。(12月21日《三湘都市报》)

“高富帅”的公立医院成了欠款的“老赖”,听着真是新鲜。省商务厅因此给省医改办发函,就更新鲜了。在公众的想象里,长沙这些大医院,应该不差钱的;大概不存在付不起这 100 亿元药款的问题。问题的性质很清楚:不是给不起,而是不愿给,医院是要重新议价。

我们一直说,应该医药分开。如今,确实是分开了,药品零加成,也就是说医院不能从药品中赚钱了。之前有 15% 的药品加成,100 个亿的药款那就是十几个亿。站在医院的角度,一下子损失这么大一笔钱,肯定也有自己的困难。取消药品加成,有个问题没有考虑到,那就是,医院虽然卖药不能挣钱了,但是相关的仓储成本、管理成本以及损耗成本,依然还在。

医院不能从药品上挣钱,等于是成了药品供应商的“免费代销点”。但是,你想想看,哪有那样的代销点,销量那么大,一分钱不挣,还要自己出仓储费,这显然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通过提高医疗服务费,大概能够补足药品加成的 80%,剩余的部分,10% 由政府补贴,另外 10% 由医院解决。医院怎么解决呢?和药品供应商二次议价算不算?笔者觉得应该算。市场竞争嘛,医院巨大的销售量摆在那里,这个药品供应商觉得不能干,别的药品供应商没准觉得可以干呢?

商务厅为此发公函,试图动用行政力量来解决,似乎有点欠妥。医院和供应商之间的事情,完全可以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还可以走法律程序。行政力量介入,到底是要为谁代言呢?如果每一起商业纠纷都需要商务部门发公函来解决,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呢?

事实上,取消药品加成对医院来说,确实是一项政策性亏损。分担的途径有三个,一是加大政府投入,二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三是通过市场议价。加大政府投入受制于地方财政,不确定性很大,而且实际上是纳税人付费;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患者肯定不乐意,刚取消药品加成,又通过其他途径补回来,那不就是数字游戏了嘛。

相比之下,发挥医院市场议价的能力,去药品供应商那里,争取到更好的价格,未尝不是一个办法。医院的损失摆在那里,总要想办法分担,这条路不让走,可能就会去走另外的路。政府财政不能足额补贴,更不应增负“看病贵”,允许医院去和药品供应商议价,便无可厚非,而且对患者有利。



吴之如·文并画

《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今年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蓝皮书: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发展报告(2016)》显示,从 2015 年下半年到 2016 年上半年,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照片信息、垃圾信息等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915 亿元。(12月20日中国新闻网)

现代社会,什么事情都讲究效率,因此诞生了一个新词,叫做“精准”。这个词令好事生辉的同时,竟然也让坏事沾边,譬如骗子也知道时下要大显身手,就必须实施“精准诈骗”,也就是得花点钱向另一拨不法分子购买大量的普通民众的个人信息,从中觅得下手的机会。不用想,这伙社会渣滓互相勾结大肆胡作非为的结果,正是许多群众受骗上当遭到经济和身心的双重损害。有道是:

个人信息防泄露,莫使歹徒有利图;网络犯罪严惩办,“精准诈骗”当扫除。

在全社会都在贯彻依法治国精神的大背景下,让法律法规无处不在,骗子们自然无机可乘,社会治安与和谐才能获得真正的保障,百姓才能真正享受到平安生活。

戏画闲言

个人信息防泄露



期待网约车新政能“见贤思齐”

海建 媒体评论员

今年 7 月 28 日,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随后各地进入了密集的细则征求意见、实施的阶段。12月21日,北上广正式发布网约车管理细则,北京、上海要求“京车京人”“沪人沪牌”,但在车辆标准上进行了放宽;广州则要求本地车牌,但不一定非要要求本地户籍。(12月22日中国新闻网)

套路深深的博弈之后,散兵游勇的网约车,终于在落地的属地新政里成了“正规军”。风口浪尖之地的北上广,选择了“不约而同”的日子发布属地新政——这姿势,本身就让人浮想联翩。好在,该来的总会来,该变的迟早会变,滚滚东逝的浩荡历史,再也开不回从前的老路。

舆论的喊话、业界的吁求,还是在严丝合缝的征求意见稿中,撬开了一些光明的出口。就像滴滴回应的,“相比之前的征求意见稿,在吸纳各方意见基础上,朝着更合理和宽松的方向做了修改。例如,北京增加了 5

个月的过渡期,上海将车辆轴距调整为 2600 毫米,且没有对排量的限制。”这些“进步”,外人看起来有些微弱,但如果比照一些庞大而基础的数据,可能终究会嗅到其中的暖意。

相关数据显示,最多的时候,一天通过滴滴出行平台的市民超过 1600 万人。新政的门槛“降低一毫米”,对于创新与创业来说,可能就是“救命的那一缕氧气”。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人社部此前会在《关于开展东北等困难地区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里,点名“支持滴滴公司等分享经济企业”。网约车的背后,有着更辽阔的中国民生出行的大背景——1.94 亿辆汽车保有量,对应着就业与收入的繁复格局,对应着支点与焦点的底层议题。

这些道理,烂熟于心。唯一须提醒的是,在北上广都能将严苛的新政撕开一道缓和出口之时,二三线城市、四五线城市,乃至更多的网约车刚刚勃兴的城市,会见贤思齐吗?不妨说得更直接一些吧:面对昭然的民生诉求,网约车新政能在准入门槛层面呈现

出“大城市高标准、小城市低要求”的梯队性宽口径特点吗?安全性可以不减,监管性可以对等,行业准入起码当尊重各自的“市情”。比如在东北等地,当考虑去产能的压力;而青岛、武汉、西安等城市,可以在轴距、排量,乃至户籍要求上更有包容而多元的作为。

给点空间,给点时间,在放宽或延长缓冲期的日子里,一方面深化巡游出租车改革,一方面规范发展网约车,这才是顺民心、贴民意的事情。有人说,户籍门槛迟早会打破,轴距纠纷早晚晚会翻篇,差别是,需要时间。在滴滴都顺利接入 12306 客户端的今天,变局也许真的只是时间而已。

当北风飞雪、归家心切的时候,我们当记住这样的数据:2015 年春运期间,曾有 190 万人次使用滴滴顺风车合乘出行,运力相当于 1000 列火车……而今,北上广新政落地,期待其他城市网约车新政多能“见贤思齐”——让网约车等得到春天,让共享经济徜徉在春风里。

为民营企业“集中供暖”的时刻到了

邓海建 媒体人

如果把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图看成中国经济的体检表,那么,其中一个陡然向下的箭头不得不引起注意。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8.3%,有媒体称,这个数字创 2000 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 2.9%,较之 5 年前同期的 25.2%,堪称断崖式下跌。民营企业日子不好过,实体经济因此凄凉。(12月20日每日经济新闻)

有时候,宏观经济的大问题,足以借助微观经济的小故事娓娓道来。

近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谈中国制造业成本危机的醒世之剧引爆朋友圈。而眼下,曹德旺投资 6 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思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如果说,李嘉诚当年的“跑路”还有羞答答的雅致理由,那么,今日曹德旺赴美办厂,就只有一个不那

么美好的缘由:地方营商环境与成本改良的脚步,跟不上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辩证法说,直面矛盾是解决矛盾的第一步。在坚守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的共识之下,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直面民营经济当下的困境。学者调研发现,一些企业苦苦支撑,有的靠偷税漏税苟延残喘,有的把资产转到国外,留在国内的企业成了空壳。这种情况在华北地区有不少,东北和中部地区更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大背景与小环境的掣肘很多,但,几乎所有的抱怨与槽点都指向两个字:成本。成本构成里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两大金刚:一是制度性税费成本,二是能源资源成本。

中国民营经济基本集中在制造业,而制造业又是对成本变化最为敏感的行业。从 2016 年中国制造业的变局来看:一是传统制造业里的电子等企业倒闭成为常态,二是“机器换人”等智能浪潮滚滚而来。当新增长

方式山呼海啸的时候,旧的路径依赖如果未曾转身,痛苦指数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诸般成本中,税费无疑成了中国民营企业五味杂陈的心头之患。

曹德旺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 35%”……这些抱怨,当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14 年、2015 年中国宏观税负均为 29.1%,低于世界平均 38.8% 的水平。当然,税负高低,因统计口径不同,存在较大争议。不过,顶层设计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减负之心,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更热烈——比如,不同于以往“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的说法,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承诺“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另一方面,税费等减负的工作,还有不小的潜力可挖。说得再直白一

些:在市场风云激荡又瞬息万变的今天,慢慢减可能等于没有减、小步降可能等于不会降。民营企业在诸多压力面前,难免会出现“等不及”的境况。或因如此,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只有真正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才能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当特朗普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靶心瞄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时候,当中国民营经济在提振“中国制造”信心与质地中占据半壁江山之重的时候——我们太有必要大刀阔斧又大步流星地为民营经济增暖减负了。让民营企业过上好日子,就业才会踏实,制造才会稳固,资本才会“安守故土”。总之,是时候,考虑为民营企业“集中供暖”了。